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血脉情缘

陆士清选集

陆士清 著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s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血脉情缘

陆士清选集

陆士清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血脉情缘 : 陆士清选集 / 陆士清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10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1辑)

ISBN 978-7-5360-6606-9

I. ①血… II. ①陆…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122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125

字 数 250,000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开拓的实绩（代序）

蒋孔阳

1955年，陆士清同志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在相互过从的当中，我们成了同事和朋友。他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做任何事都生气勃勃，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即如“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1978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在大学教学和学科的建设中，还没有怎样引人注意，他就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一马当先，率先主持编写了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曲折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作家和作品等，进行了历史的透视和总结，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人们对“左”的一套尚心有余悸，我国大陆文学界绝大多数人对海峡彼岸的文学情况尚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士清同志又鼓起了勇气，开始介绍和研究台湾文学。十多年来，在客观条件相当困难、资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他执著努力，孜孜不倦，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这本《台湾文学新论》，就是明显的例证。香港评论家黄维樑博士，誉之为是“先锋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的结集。

士清同志研究的范围相当广阔，大凡台湾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的动因，文学思潮的演变，传

统的继承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创作题材的拓展，主题意识的变化，风格的形成和出新，文学样式的兴衰等等都在他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是，他的基点和追求目标却是全景观照，宏观把握与微观深入的结合。在宏观把握方面，他将台湾文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历史的追踪，对之进行全景描述。例如《现代台湾文学》一文，即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总体的描述，使人对台湾新文学运动，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同时，在微观方面，他又对作家创作艺术的具体特点，对某些文艺思潮、文艺杂志、以至某部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诠释和探讨。他不为积习和陈见所囿，不为毁誉与流言所惑，而力求以批评家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因而独具慧眼，言人之所未言。如《论杨逵小说创作的历史地位》、《融传统于现代——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艺术追求》等等，都是例子。

台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对之研究乃是应有之义。但因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特殊发展，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从而影响到台湾文学。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既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对之进行专门的研究，总结它的历史经验，介绍和阐释它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必将有助于处于分隔状态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文学的交流和融合，必将有助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士清同志的台湾文学研究，自觉地认识到他的历史使命，他是在有意识地为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一砖一瓦的贡献。众所周知，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50年。1945年光复了，但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两极体制对峙的结果，1949年，台湾又与大陆隔离。这是民族的不幸！结束这种不幸，是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神圣职责。士清同志这本书，正是抱着炎黄子孙拳拳报国之心，希望借助对台湾文学的研究，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增进两

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为结束民族分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士清同志十分关心台湾内部的“统”“独”斗争以及它在文学、文化领域中的反应。值得称道的是，面对台湾文学、文化领域中的“统”“独”之争，士清不是视而不见，消极躲避，而是积极介入，去了解它，研究它。对台湾文学和文化界出现的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独意识”，以及淡化台湾文学的中国意识，歪曲台湾新文学传统、将台湾新文学界的前辈和精英，说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等现象，他都坚持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意识》等文，他根据史实指出：“中国意识”恰恰是台湾新文学的灵魂。台湾新文学运动，“在动因和目的等诸方面都表现了强烈的‘中国意识’”。台湾新文学所蕴含的中国取向，即把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祖国复兴，他认为这是“中国意识”的突出表现。台湾新文学的先驱都有一个中国魂。他以丰富而确凿的史料，雄辩而有力地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士清同志是一个开拓进取的学者，也是一个治学谨严的学者。他研究台湾文学，注意材料的选择。他起步较早，在研究中一直忠于史料。台湾文坛思潮起伏，错综复杂，派中有派。他不是从派的概念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以文学本身的现象为依据，以科学的文艺观为指导。对于不同的社会和环境以及不同的对象，也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他在《谈欧阳子的“情结”小说》一文中，对欧阳子小说创作的评论，即是一例。士清同志的特长是治史，所以他能够以史家的态度对待文学史上的史料和史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例如为了确切了解《文学杂志》的文学宗旨、创作倾向，以及它在介绍西方现代文学、催生台湾现代小说方面所起的实际作用，他检阅了全部《文学杂志》，然后才写出了《〈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小说》一文，作出了科学的论断，纠正了以讹传讹以至胡乱猜

测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之所论，基础扎实，经得起检验。

台湾文学，我很少接触。平时听士清同志谈起未，娓娓动听，但毕竟所知有限。现在，读了他的新著《台湾文学新论》稿子，方才感到台湾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别具风格的一株奇葩。士清同志说，台湾文学的研究现在才真正开始，这说明了他对自己有着更高的期望，祝福他在台湾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结出更大的硕果。

1993年1月于复旦寓所

目 录

开拓的实绩 (代序) / 蒋孔阳

现代台湾文学 1

试论“台湾文学”与“台湾意识” 30

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意识 45

《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小说 58

略论《现代文学》杂志 69

血脉情缘

——泰华作协、《泰华文学》素描 87

世界华文文学双重传统问题的思考 97

“去中国化”的表演

——评“文化台独”对赖和的歪曲 104

论杨逵小说创作的历史地位 118

白先勇的小说技巧 139

陈映真的小说 146

诗与情

——杜国清的世界 152

现实与现代的诗情升华

——对非马创作的一种解读 164

在传统的大地上

——曾敏之创作的文化血脉 176

无声的明月嘹亮的歌

——秦岭雪《明月无声》漫议 186

缤纷的一树

——略论彦火的游记创作 204

於梨华和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217

论《桑青与桃红》 231

谈欧阳子的“情结”小说 243

扶桑枫叶别样红

——略谈华纯的创作 254

蓉子专栏的艺术魅力 263

航向彼岸

——谈梦莉的散文创作 268

陆士清学术年表 274

后记 278

现代台湾文学^①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的殖民统治没有也不可能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内在联系。现代台湾文学，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始终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日本占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日本侵占台湾以后，台湾同胞进行了连绵不断的英勇的武装反抗，但都失败了。台湾同胞在痛苦中思索和寻找前进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新的启示和鼓舞，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以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作为争取自由，反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钟肇政语）。1919 年，留学日本东京的台湾青年组织了“声应会”，1920 年“声应会”改组为“启蒙会”，接着又成立了“台湾新民

^① 《现代台湾文学》一文，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一个条目（见 1986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1037 页）。这条目是本人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武治纯先生合作、于 1985 年编写完成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将台湾文学作为条目收入辞书，辑录于此，一是为了留下历史的印迹，一是为了纪念已作古多年的武治纯先生。

会”，创办《台湾青年》杂志，提倡民主自由。《台湾青年》在创刊号的《刊头辞》中宣告：“厌恶黑暗而仰慕光明——这样的觉醒了。反抗横暴而（服）从正义——这样的觉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之野兽生活，而谋共存的、牺牲的、互让的、之文化运动——这样的觉醒了。”1921年，台湾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在本岛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标志着当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以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他们举办文化讲演会、讲习会，设立读报所，传播科学民主思想，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工农运动也开始蓬勃兴起。1925年，继台湾“蔗民组合”成立之后，各地纷纷成立“农民组合”，并进一步联合组成台湾农民联合会，与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掠夺进行抗争。1926年，台北机器工会成立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几十个工会，并在1927年掀起了全岛性的罢工风潮。作为民族解放运动一翼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和滋养下，应运而生。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几个阶段。即20年代初到20年代末的奠基时期，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的繁荣发展时期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的沉寂时期。

奠基时期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不久，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就提出普及白话文的任务。1922年1月，《台湾青年》发表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翌年初，由《台湾青年》改名而来的《台湾》杂志，相继发表黄呈聪、黄朝琴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等长篇论文，大力提倡白话文。黄呈聪在文章中说：“我今年六月到过中国的地方，看过了这个白话文普及的状况，一般得着便利很大，更加确实感觉有普及的必要”。他又说“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现时中国文化的进行有一日千里之势”，台湾只有普及白话文，才能“永久联络大陆的文化”，才能增加民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促使民众觉醒，“来努力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黄朝琴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前途实在有望”的表现，“我们台湾同胞，亦是汉民族的子孙，我们有我们的民

族性”，普及白话文，普及文化，才能保持汉民族文化，保持我们的民族性。同年4月，《台湾》杂志社在台南市成立“白话文研究会”，展开传播白话文的工作。同时，在东京的《台湾》杂志编辑部创刊《台湾民报》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这个旨在“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气”的杂志，身体力行普及白话文，全部文章都用白话文书写，白话文的普及进入了实践阶段。

白话文的提倡和实践，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台湾民报》从创刊号开始，就刊登了大陆各地的新文学作品，接着发表了在上海学习的许乃昌的长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介绍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的情况。1924年，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张我军投身台湾新文学运动，继《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呼吁排斥旧体诗和八股文之后，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猛烈抨击“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丝活气”的台湾文学界，介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和新文学作品，呼唤文学革命。他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张我军的文章，激荡了台湾文坛，引起了新旧文学的论战。经过激烈的辩论，文学革命的主张赢得了支持，旧文人不得不沉默下来。这时，张我军又相继发表了《诗体的解放》和《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章，提出了“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的主张。1925年3月，杨云萍、江梦笔创办台湾第一本中文白话文学杂志《人人》（发行2期）。《台湾民报》也开辟了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文艺专栏。

台湾的新文学创作最早可追溯到追风（原名谢春木，又名谢南光）的日文作品。1922年，他在《台湾》杂志上发表了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姊妹们》，批判封建的婚姻制度，通过对女主人公桂花觉醒的描写，喊出了妇女要求解放的心声。1923年4月，他以《诗的模仿》为题，创作了《小诗四首》。此后，在上海上学的施文杞相继发表白话诗《送林耕馥君随江

校长渡南洋》、《假面具》，杨云萍发表白话诗《这是什么声？》，张我军发表白话诗《无情的雨》、《弱者的悲鸣》等作品。1925年12月，张我军出版了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这些都是台湾新文学创作的最初的收获，但是现代台湾文学坚实基础奠定，还是在赖和崛起以后。

赖和（1894—1943），台湾彰化人，台湾医学学校毕业后在彰化行医。1917年内渡厦门，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1919年返台，一边行医，一边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成了改革台湾最热情的青年。1922年开始在《台湾》杂志发表《刘铭传》、《文天祥》和《阿芙蓉》等具有鲜明民族意识的旧体诗词。新旧文学论战展开以后，赖和积极支持新文学运动，同时开始创作。1925年8月发表白话散文作品《无题》，同年12月发表新诗《觉悟下的牺牲》，1926年春发表白话小说《斗热闹》、《一杆“秤仔”》。此后相继发表了《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可怜她死了》、《惹事》、《丰作》和《善讼人的故事》等小说，《琉璃曲》、《生与死》、《南国哀歌》和《低气压的山顶》等新诗，《忘不了的过年》、《无聊的回忆》、《前进》等散文，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赖和一生坚持用中文创作。他的作品以台湾的农民、工人、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尖锐地揭露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罪恶，描写台湾同胞的痛苦生活，同时歌颂他们的不屈和反抗。他赞美蔗农的觉悟（《觉悟下的牺牲》），呼唤秦得参式的以血还血、以命换命的斗争（《一杆“秤仔”》），颂扬挺身面对殖民主义者的毒气、机关枪、飞机、爆裂弹的精神（《南国的哀歌》），展示台湾同胞在黑暗中坚持前进的心志（《前进》），希望在毁灭中求得再生（《琉璃曲》）。赖和的创作体现了反对奴役、反对压迫、反对榨取的反抗精神，树立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启示了台湾新文学的社会写实的方向，确立了争取民族解放、争取自由平等的传统。赖和长期主持《台湾民报》和《台湾新民报》文艺栏的编务工作，他的文学创作和献身精神直接影响着同时代的作家，不少后起的作家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扶持下成

长起来的。“当时如果没有一位像赖云氏（即赖和）那样既有创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对新文学事业的推展抱着热情和决心的人，来担当、领导这个时期，并担任这艘台湾新文学的大船的舵手，则相信台湾的新文学，是无由达成若今日的状态和成就，而且一定还要走多少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吧！”（杨守愚《小说与赖云》）“赖和的崛起才奠定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基础”。赖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的鲁迅”。

在这阶段，与赖和一起为台湾新文学奠基的作家还有张我军，他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这阶段，杨云萍发表了短篇小说《光临》、《兄弟》、《黄昏的蔗园》，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光临》是对充当殖民主义统治走狗的讽刺，《黄昏的蔗园》则是对日本制糖会社盘剥蔗农罪行的揭露，发出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难道我们永远应该做牛马吗”的抗议。

繁荣发展时期 进入 30 年代，新文学创作得到迅速的发展。30 年代伊始，台湾新文学运动由分散的自然演进状态，逐步向有组织的、趋向统一行动的阶段过渡。它的舞台也由主要依靠《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报刊而发展到独立创办文学杂志。1931 年王锦江等与日本作家组织了“台湾艺术作家协会”，创办了《台湾文学》杂志（发行 6 期）。同年，郭秋生等在台北、台中组织了“南音社”，创办了《南音》半月刊（发行 2 期）。1932 年，台湾留日学生张文环、王白渊、巫永福等在东京组织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创办了《福尔摩沙》杂志（发行 3 期）。1933 年，郭秋生、黄得时、朱点人、王锦江等在台北组织了“台湾文艺协会”，创办了文艺杂志《先发部队》（第 2 期起改名为《第一线》）。1934 年，为了团结全台作家，推进新文学运动，由台中作家倡议并筹备召开了全岛文艺大会，成立了包括赖和、杨逵、张深切等 80 余位作家参加的全台统一组织“台湾文艺联盟”，创办了《台湾文艺》杂志（发行 15 期）。1935 年杨逵又创办了《台湾新文学》，并发行《新文学月报》。《台湾新文学》发行了 15 期，于七七事变前夕停刊。

文学社团的产生，文艺刊物的创办，为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阵地，催生了一批新作家（包括以中文写作和以日文写作的作家）。陈虚谷、杨守愚、杨华、杨逵、蔡愁洞、郭秋生、吴希圣、张深切、毓文（廖汉臣）、巫永福、朱点人、王锦江（王诗琅）、黄得时、吕赫若、翁闹、张文环、王白渊、张碧华、张庆堂、郭水潭、徐玉书、龙瑛宗等相继登上文坛，以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作品，迎来了台湾新文学创作（包括中、日文作品）的丰收。陈虚谷、杨守愚、杨华从2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进入30年代，陈虚谷继续创作新诗，写了《草山四首》、《敌人》、《流水和青山》等作品。杨守愚继《凶年不免于死亡》、《谁害了她》之后，写了《一群失业的人》、《决裂》、《十字街头》、《升租》、《鸳鸯》、《赤土与鲜血》等小说，同时写了《人力车夫的叫喊》、《长工歌》、《洗衣妇》、《雨中田舍》、《女性悲曲》等大量新诗作品，在创作题材方面表现了繁复的多样性。杨华在写《薄命》等小说的同时，相继发表了短诗集《心弦集》、《晨光集》和创作于20年代末的《黑潮集》。他们是台湾新诗创作颇具代表性的作家。蔡愁洞在30年代开始创作，他的《保正伯》、《夺锦标》、《新兴的悲哀》、《理想乡》等小说以轻松诙谐的形式、嬉笑怒骂的技法，把日本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讽刺挖苦得入木三分。吴希圣的作品不多，但他的小说《豚》，描写台湾农民的苦况，一时成为文坛议论的中心。毓文既写小说，也写新诗和剧本。小说《玉儿的悲剧》描写不平等所带给妇女的痛苦，《短诗》则唱出了改造旧世界的衷曲：“要是可以睨视青天/占住大地/就算死了/我也愿意/为的（是）洗净这秽浊的全球/我愿倾尽满腔的热血”。巫永福的小说《山茶花》、《欲》，侧重勾画男女的恋情和暴露人性的丑面，这在以揭露社会黑暗、控诉殖民主义压迫为主潮的台湾新文学中，是不多见的。朱点人当时就被誉为“台湾新文学创作界的麒麟儿”，他的《无花果》、《纪念树》、《安息之日》等小说，侧重解剖人性的阴暗面；而《岛都》、《秋信》、《脱颖》则是深具批判精神的抗议文学。王锦江既有诗作也写小说。他的诗句充满了创造新生活的激情，而小说笔调则

比较冷静。小说《雨夜》、《没落》描写投身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实践者的心态，《十字路》则透视了先觉者的行动对民众积极的影响。张庆堂的小说，大都以生活在重压下的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写他们坚持做人的信念和责任，以及在恶劣环境下求生的意志和奋斗的勇气，《年关》、《死亡》较为阴郁，《生与死》、《他是流眼泪了》则明朗得多。吕赫若的小说喜欢取材农村家庭生活。《牛车》描写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悲剧。

在这阶段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中，杨逵是杰出的代表。杨逵（1905—1985），台南新化人。1924年东渡，在日本大学攻读文学。1927年应“台湾文化协会”召唤，回台湾投身农民运动，并被选为“台湾农民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3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32年发表中篇小说《送报夫》。此后相继创作了《顽童伐鬼记》、《模范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种地瓜》、《春光关不住》等小说。《送报夫》写的是台湾青年杨君觉醒的历程。日本制糖公司强行低价收购土地，逼死了杨君父亲。在日本进步工人的帮助下，杨君懂得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团结奋斗。他参加了工人运动，与日本工人一起斗败了派报所老板。最后满怀信心踏上归途，准备投身故乡的斗争。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意识开始在台湾传播，1928年到1931年台湾革命运动高涨。杨逵的《送报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通过杨君的生活和思想历程的描写，既展示了民族斗争，又展示了阶级斗争，突破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小说主人公杨君的觉醒，还表现在他对于被压迫阶级自身力量、以及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认识和实践上。这里，杨逵探索了别的台湾作家没有涉及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新道路。杨逵还殷切期望有着新型的社会经济和道德关系的社会的出现。在《送报夫》中，他以极大的热情描绘无产者之间的相互同情和友爱。这在此后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模范村》中，杨逵描写了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同情，甚至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模范村”里，创造了一个与现有秩序完全相反的、同舟共济的、互助互利的理想社会。在《鹅妈妈出嫁》中，杨

遼在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唱的所谓“共存共荣”时，则向往着“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的明天。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进行尖锐的揭露和血泪的控诉，同时以乐观和信心来唤起人们的希望。总之，杨遼的出现，从思想上把台湾新文学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阶段台湾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不仅表现在作家作品的众多，题材的扩大和思想的深化，而且表现在艺术技巧的进步上。奠基时期的一些小说侧重描写事件的过程，陈述人物的命运，正面表现人与人的冲突，一般都笔触粗疏，手法较单调。进入30年代后，包括赖和写的《惹事》、《善讼人的故事》等在内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成熟了。作家的视野开阔了，比较注意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情节显得丰富，人物形象较为生动。除了真切的写实之外，创作上还运用了暗示象征的手法，出现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小说作品，受到祖国大陆和日本文坛的瞩目。1936年杨遼的《送报夫》、杨华的《薄命》、吕赫若的《牛车》等小说由胡风等翻译收入《山灵》，在上海出版。赖和、翁闹、张文环、龙瑛宗等人的作品或被译成日文或者被日本报刊推荐为“佳作”。台湾新文学运动盛极此时。但这种发展趋势，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所打断。

沉寂时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配合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下令取缔台湾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运动，废止汉文书房（学馆、私塾），禁止报纸杂志的汉文栏，控制言论阵地，迫使台湾新文学园地——《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相继停刊。由于发表阵地的丧失，压迫的加剧和战争的激化，台湾作家有的沉默了，有的动摇了。曾经蓬勃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沉寂时期，从七七事变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发展，日本殖民主义者推行“皇民化”（即奴化）运动，强迫台湾同胞穿和服，说日语，改姓日本姓氏，推广日语家庭和日化家庭。1940年，日本作家西川满等人在殖民当局的支持